

# 霸權與挑戰：國際關係理論的詮釋\*

吳玉山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傅澤民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 摘要

國際關係理論是與現實的國際政治高度聯結的，此一現象在當今表現地極為明顯。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召喚著能夠掌握與回應現況的國關理論，其中尤以「權力轉移」和「歷史與國關」兩類文獻最具有解釋力與發展性。本文從權力轉移理論的核心論點與適用的範圍條件切入，接著聚焦於此一理論的兩個關鍵變項：權力差距與挑戰者對現狀的滿意程度，並延伸到戰爭的爆發條件與對理論的挑戰，最後是討論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新興理論框架。在這一部份又分為三個部分：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策略選擇、支配型強權對於崛起國的策略選擇，和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策略組合。在處理完權力轉移的相關理論後，我們進入「歷史與國關」的討論，特別是著重於對於中國對外行為的歷史理解。我們首先討論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今日中國「再起」的必要性，而後提出用「是否跨時」與「是否跨域」的兩個向度來把文獻分類，接下來進入歷史與國關的論辯焦點：文化是否又如何扮演影響中國對外行為的重要角色。我們提出兩種答案：

---

\* 本文於111年8月5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舉辦之「政治學的現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特此感謝陳欣之教授提出之評論與建議。

普適論（包括文化無關與現實含攝文化的看法）與特殊論（包括權力與理念分配並列與階層滿足兩種型態）。最後，我們對於霸權與挑戰的國關理論詮釋做出總結，強調權力轉移理論可以捕捉美中爭霸的客觀因素，而歷史與國關可以深化對於爭霸的主觀理解，二者對於理解當代的霸權與挑戰都是不可或缺的。

**關鍵詞：**國關理論、美中爭霸、權力轉移、歷史與國關、霸權挑戰

\* \* \*

## 壹、理論與現實

國際關係理論是與現實的國際政治高度聯結的。由於歐美主導國際政治多個世紀，傳統的國關理論乃多基於西方的歷史經驗，反映出歐美學者對於國際關係的耙梳整理與理論構思。到了晚近由於西方的霸權受到挑戰，這一個脈絡的思路在學術界也引起了一波波的反省，然而不變的是國際關係的演進驅動了國關理論的發展。時至今日，美中爭霸已經成為21世紀國際關係的主旋律，無論是傳統與非傳統的安全議題、經濟與全球化，或是意識形態的爭議，都緊緊地扣合著美中兩大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競爭。因應著國際關係的這個結構性變遷，國關理論也經歷著劇烈的興衰變動。

有關於國際關係的思想淵源甚早，古印度的Kautiliya便是一位著名的國關思想家（Modelski 1964），他發展出了國家距離遠近與彼此關係是相互聯結的看法；而馬基維里對於人性本惡、理性計算，與政治道德分離等看法也對後世國關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Machiavelli 1981）。現代意義的國關理論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而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辯息息相關。當時E.H. Carr的《20年危機：1919-1939》被認為是「現實主義革命」的開山之作，清楚地闡釋了「權力」在國際關係中的核心意義（Carr 1940）。在這些早期的國關思想與國關理論當中，所汲取的多半是列國競爭的國關歷史，諸如歐洲在1648年以後所建立的西伐利亞秩序。以現實主義而言，最居於優勢地位的便是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這是以追求均勢作為各

國行為的自然歸趨，以權力平衡作為國際體系的經常狀態，並且在均勢與和平之間建立連繫，提出特定的權力分配形式與體系的穩定性彼此因果相關。

二戰結束後出現了美蘇相互對峙的冷戰時期，國關理論家在傳統所熟悉的多元體系與兩元體系的現實之間來回探索，但是關注的重心還是權力平衡。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參酌個體經濟學的觀點，把原有的現實主義理論更加形式化（Waltz 1979）。他用「內部均衡」的概念來處理在兩元體系下不容易運作的「外部均衡」（即藉著國家間的聯盟來達成均勢），但核心還是在權力平衡。另一方面，深受19世紀歐洲傳統影響的季辛吉則把多元的可能引入美蘇競爭，提出了戰略三角的概念，並且把他的學術觀點帶入美國實際的外交政策，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Kissinger 1995）。無論如何，在現實主義陣營，權力平衡還是居於主流的思想，而核子武器所帶來的恐怖平衡也被納入其中。

長期的冷戰對峙與相互保證毀滅的恐怖平衡驅動了對於現實主義的反思，也帶來冷戰末期開始興起的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思潮。這些思潮鬆動了現實主義的諸般前提，安全至上、理性思維、單一行為者等預設都被一一檢視修正。反現實主義的國關理論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獲得最大的發展契機（Baldwin 1993; Wendt 1999）。美國獲得了獨霸的地位，而其所信仰與推廣的全球化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體制似乎沛然莫之能禦。現實主義者所習慣的兩元與多元體系、國家安全至高無上、冷酷的權力計算，與將國家視為單一行為者的種種假說，都顯得無法掌握住現實。在此種情況之下，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反映了相當的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觀點，而不再以現實主義作為圭臬（Mearsheimer 2021）。

如果西伐利亞秩序下的國際關係驅動了現實主義與權力平衡理論的發展，兩元體系下的冷戰提供了結構現實主義興起的環境，對恐怖平衡的拒斥與後冷戰時期美國自由主義霸權開啓了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發展的契機，那麼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對美國與西方霸權的挑戰，就必然地推動了新一波國關理論的浪潮。中國的崛起來得又急又快，在1980年代才開始的經濟改革一方面提供了經濟增長的動力，但也引來了劇烈的社會與政治動盪。不過在度過了1989~1991年天安門事件與蘇東共黨政權崩潰的危機之後，中共抓住了兼顧經濟增長與維持黨國政治控制的訣竅，開始了改革派共黨統治下30年的快速發

展，並在超越除美國之外所有的西方大國（包括日本）之後，獲得了與美國比肩競爭的地位。這一個新的國際關係格局，是前代的國關理論所無法切中解釋的。

美中的關係是現狀的支配性強權受到崛起強國的威脅，二者之間發生了越來越劇烈的摩擦，甚至有爆發戰爭的可能。這顯然不是傳統的西伐利亞體系下的多元體系，也非美蘇間穩固的兩元結構與恐怖平衡，或是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所能擬想的超越現實主義格局，而是支配性強權與快速接近的挑戰者之間的戰略競爭。照說依照權力平衡理論，美中之間的均衡態勢應該有利於和平與體系穩定，但是實際的情況顯然並非如此。在西方的國關理論當中一直有一個非主流派別，強調層級體系而非權力平衡才是穩定的前提。此一層級觀點主要提出了兩種論述，一是當霸權為體系提供必要的公共財時體系最為穩定；一是當霸權受到挑戰的時候體系可能會面臨戰爭。前者最有名的就是Charles Kindleberger根據二十世紀兩次大戰之間經驗所發展出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而後者則是A.F.K. Organski在1950年代就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Kindleberger 1973; Organski 1958）。在這兩種理論當中，最為切中當前美中競爭的自然就是集中關注霸權與競爭的權力轉移理論。

權力轉移理論經常是以抽象的理論形式提出，另外晚近藉助歷史來深化其經驗內涵的「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之說也大行其道。此說出自Graham Allison，其理論的根源是在古希臘時期，當各個城邦國家聯合起來擊敗了波斯帝國的大軍之後，代表海權的雅典便開始挑戰斯巴達的陸上霸權，釀成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為史家修昔底德所記載，顯示爭霸必有戰爭，故而暗合權力轉移理論。在Allison（2017）所著的*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書中，探究了近五個世紀以來國際關係史上的16次重大權力轉移，發現其中有12次都出現戰爭，機率是75%。因此Allison便問到，究竟現在正在進行的美中權力轉移會不會導致戰爭？固然Allison對於修昔底德歷史記述的理解是不是正確容有爭議（Lee 2019）；而他近來也從北宋與遼在澶淵之盟之後的百年和平（相互對抗但無主要戰爭，或稱rivalry partners）獲取了更多的歷史啓示，不像過去

悲觀，然而Allison從歷史尋求分析的洞見則是始終一致的（Allison 2019）。Allison的研究把我們的視線導引到「歷史與國關」的文獻。此一文獻以國關史為材料，來發展出對於國際關係的識見，形成詮釋美中爭霸的獨特角度，特別在研析中國對外行為方面，提出了重要的看法。

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將從權力轉移理論的核心論點與適用的範圍條件切入，接著聚焦於此一理論的兩個關鍵變項：權力差距與挑戰者對現狀的滿意程度，並延伸到戰爭的爆發條件與對理論的挑戰，最後是討論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新興理論框架。在這一部份又分為三個部分：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策略選擇、支配型強權對於崛起國的策略選擇，和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策略組合。在處理完權力轉移的相關理論後，我們將進入「歷史與國關」的討論，特別是著重於對於中國對外行為的歷史理解。我們首先討論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今日中國「再起」的必要性，而後提出用「是否跨時」與「是否跨域」的兩個向度來把文獻分類，接下來進入歷史與國關的論辯焦點：文化是否又如何扮演影響中國對外行為的重要角色。我們提出兩種答案：普適論（包括文化無關與權力含攝理念的觀點）與特殊論（包括權力與理念分配並列與階層滿足兩種型態）。最後，我們對於霸權與挑戰的國關理論詮釋做出總結，強調權力轉移理論可以捕捉美中爭霸的客觀因素，而歷史與國關可以深化對於爭霸的主觀理解，二者對於理解當代的霸權與挑戰都是不可或缺的。

## 貳、權力轉移理論的核心論點與適用的範圍條件

權力轉移理論起源於其鼻祖J.F.K. Organski（1958; 1968）對當時的國際關係學術霸權——權力平衡理論所發起的學術挑戰。信奉權力平衡理論的學者主張，無政府狀態（anarchy）是國際關係的特質，並強調權力平衡是國際體系最終總會達致的均衡（equilibrium），並能促進體系的穩定（Waltz 1959; Morgenthau 1978）。Organski駁斥了這種看法，認為層級體制（hierarchy）才是對國際關係特質更準確的描述，國際體系中權力集中（concentration of power）是常態，且有助於和平的維繫，權力平衡反而容易導致戰爭的爆發。權力轉移理論強調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行為者，國家領導人是理性

的。權力轉移理論家將層級體制描述為一個權力金字塔，其中有一個支配性強權（*dominant power*）佔據金字塔的頂端，其下則有數個一般強國（*great powers*），為數不少的中等國家（*middle powers*），以及數目繁多的小國（*small powers*）。支配性強權可利用權力來建構一個揉合政治、經濟及規範等面向的國際秩序來管理國際體系，一方面增進其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則維繫國際體系的穩定，因此它是滿足（*satisfied*）的。對國際秩序滿意的其他國家追隨支配性強權的領導，並從中得到一定的好處。在支配性強權的權力無與倫比時，權力的集中確保了穩定的存續甚至和平（*Tammen et al. 2000*）。

按照權力轉移理論的論述，支配性強權之所以能登上權力金字塔之頂端，並制訂對已有利的國際秩序運作規則，關鍵在於其率先經歷了由工業化所驅動的高速經濟發展，從而能擁有其他國家無法企及的國力。當支配性強權的經濟成長動力減弱時，其他一般強權若能透過工業化達成比支配性強權更迅猛的經濟發展，便能改寫其與支配性強權間相對權力的對比（*Organski and Kugler 1980*）。這樣看來，工業化帶來了由國家內部而外（*inside-out*）的變革動力，內部經濟發展速度的不同則是導致支配性強權權力優勢喪失的根本原因。

權力平衡理論（*Waltz 1979; Walt 1987*）一般認為同盟體系的轉換是導致國際權力分配變化之重要機制，但權力轉移理論則強調，在工業化的時代下，同盟的形成與瓦解並非權力重新分配的主要機制，這是因為國家間的聯盟在工業化時代更加僵固，換盟的可能性低（*Organski 1958, 313-316*）。由於將權力轉移理論設置了嚴格的適用條件（*scope conditions*），*Organski*（1958, 307）表示，他所發展出來的理論僅能適用於有些國家已經工業化，有些國家還尚未工業化的階段，因為他堅信工業化程度的不同是導致國際體系權力產生重新分配之最重要因素。職是之故，這一個理論無法解釋前工業化時代，而當所有國家都已工業化時，新的理論必須應運而生。新一代的權力轉移理論家雖然都同意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但他們已經普遍不再把工業化的不均勻發展視為國際體系權力再分配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舉例來說，*Kim*（1992）研究1648年至1815年的歐洲歷史，清楚展示了同盟的形成完全可以在短期內大幅提昇一國的權力，工業化並非是催生出新的權力分配之必要條件。*Organski and Kugler*（1980, 56）更承認了同盟體系對於支配

性強權與挑戰者間戰爭之結果影響甚鉅。事實上，如Levy（2008, 19）所揭示的，雖然決定一國經濟發展程度及國力的主要機制在不同的時代可能不盡相同，但這僅僅代表學者必須因時因地制宜，發展出合適的概念量測尺度，從而能指出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情況並洞見相對權力對比的可能變化，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邏輯並不會因此受到影響。那麼權力轉移理論又是如何將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與再分配連結到國際體系的穩定與否呢？

## 參、兩個關鍵變項：權力差距與對現狀的滿意程度

當國際秩序被支配性強權所護衛，且其權力優勢明顯時，其他的國家或者對現狀滿意因而沒有意願改變現狀，縱使是有意願也缺乏能力來發起挑戰。可能挑戰支配性強權的國家充分瞭解，以現有的權力差距，自己在與支配性強權的衝突中毫無勝算。權力轉移理論宣稱，只要這樣權力結構得以維持，國際體系便能保持穩定。根據Organski and Kugler（1980）的計算，這代表沒有任何一個新興強國的權力達到了支配性強權的80%。當國家的權力分配產生變化，一個原居於第二層級的強國成功地拉近甚至扭轉了它和支配性強權之間的權力差距，亦即一個新興強國的權力達到支配性強權的80%至120%這個區間時，新興強國和支配性強權就可能產生關係上的緊張，但要判斷國際體系是否會發生戰爭必須進一步檢視崛起國對現狀秩序的滿意程度。<sup>1</sup>依Lemke and Kugler（1996）的詮釋，權力轉移下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間達成的均勢只是賦予了挑戰者機會（opportunity），對現狀的不滿意才創造出挑戰者一戰的意願（willingness）。

具體來說，崛起國若滿足於國際秩序，那麼即使支配性強權的權力優勢衰退，雙方的權力對比進入均勢（parity），或崛起國的國力超越（overtaking）了支配性強權，兩者也不會衝突。然而若崛起國對現狀不滿（dissatisfied），便可能會要求支配性強權大幅修改現存的秩序，甚至可能完全顛覆現有國際

<sup>1</sup> 當新興強國的權力超過支配性強權的120%時，表示新興強國已經取原來的支配性強權而代之，成為其他國家不可匹敵的新支配性強權。此時由於權力的分配又定於一尊，國際體系的穩定性還是可以確保。

秩序，另行打造對其有利的國際秩序。由於支配性強權對現狀滿意因而有護持現狀的誘因，因此必然會抗拒挑戰者修改現狀的要求，衝突於是變得極為可能（Tammen et al. 2000）。綜言之，國際體系的穩定性首先取決於支配性強權是否具備權力優勢以威懾潛在挑戰者。當權力的分配集中於支配性強權時，威懾效果極佳，國際關係是最穩定的。權力集中為國際體系帶來穩定，權力平衡則否。<sup>2</sup>當支配性強權與原為一般強國的崛起國權力拉近時，威懾的效力不再，但倘若崛起國對國際秩序滿意，國際關係仍會是穩定的。<sup>3</sup>對國際關係穩定最不利的狀況便是出現了一個強大而又對國際秩序不滿的挑戰者。挑戰者崛起的速度越快，支配性強權因應權力分配變化的彈性越低，都會進一步提高戰爭爆發的機率（Organski 1958, 323-37; Tammen et al. 2000, 14）。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權力轉移理論最重要的兩個解釋變項便是相對權力的變化以及對現狀的滿意程度，兩者的交互作用將決定國際體系是和是戰。以下，我們將依序討論權力轉移理論家如何概念化及測量這兩個關鍵的自變項。

探討國家間的相對權力變化時，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如何界定並測量權力。權力轉移理論家一般將權力定義為一國控制或改變他國政策以推進本國政策目標之能力（Organski and Kugler 1980）。由於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強權興衰的根源主要來自於各國內部發展程度的不同，因此在測量權力時，權力轉移理論將可能影響內部發展程度的要素置於核心位置。這點與權力平衡理論在論及權力時，念茲在茲的是軍事實力有明顯差異。在經過概念的綜整後，Organski（1958, 203-210）提出一國之權力或謂國力強弱是由三個要素所決定：人口、經濟生產力與政治能力。其中人口是指勞動人口與軍力人數，由於直接影響了經濟生產的規模以及戰爭時所能動員的人數多寡，因而是權力的基礎，其影響是長期的（Kugler and Swaminathan 2006）；經濟生產力指的是將資源投入轉換經濟產出的能力，改變較為迅速，對國力的影響是中期的；至於政治能力

<sup>2</sup> Lemke（2002）展示了，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邏輯不僅在全球範圍適用，更可延伸至區域的次級體系。

<sup>3</sup> Chan, Hu, and He（2019）即是在此基礎上推斷，由於中國在本質上並非是修正主義式的國家，也確實展示了願意融入現存國際秩序的意願，因此只要美國願意正視並容納中國的崛起，滿足中國的地位（status）需求，美中間的衝突完全可以避免。

則是政府爲了達成國家目標之資源汲取及配置的能力，可以在短期之內對國力產生較大影響（Tammen et al. 2000; 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政治能力對於國力的影響固然重要，但對於如何具體測量這一個概念，研究權力轉移的學者一直到近期才取得基本的共識。Organski and Kugler（1980）率先提出並初步發展了政治能力的概念，Arbetman and Kugler（1997）將之細緻化，Kugler and Tammen（2012）集大成，一個多面向且相對成熟的政治能力指標於焉而生。<sup>4</sup>殊爲可惜的是，權力轉移的研究者在探討權力轉移與國際體系是否會出現戰爭的關係時，並沒有系統性地將政治能力納入權力測量的面向，而主要是仰賴兩個既有的指標來度量權力：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以下簡稱：GNP）或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sup>5</sup>，以及國家實力綜合指數（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以下簡稱：CINC）。<sup>6</sup>GDP是由人口和國民的生產力決定的，國家實力綜合指數中人口亦佔有相當的權重，因而對權力轉移理論來說，要成爲世界大國就勢必要擁有大量的人口。這一點在各國間的生產力差距逐漸縮小後尤然。這解釋了爲何權力轉移理論學者預期中國及印度將依序取代美國成爲國際體系的支配性強權（Tammen and Kugler 2006a），因爲它們都具有巨大的人口優勢。

由於GDP與國力綜合指數在統計上呈現高度的相關性，因而研究權力轉移的學者一般將兩者交替使用，宣稱不影響分析之結果。這樣的論斷在近期受到了學者的挑戰。Rauch（2017）將GDP和國力綜合指數套入實際的案例分析，發現統計上的高度相關並不能確保這兩個指標在判斷挑戰者何時趕上或者超越現狀的支配性強權的一致性。舉例來說，GDP和國力綜合指數對於1820至1910年間，對於美國和英國國力變化確實呈現出類似的趨勢，然而在美國

<sup>4</sup> 在這個框架下，權力被操作化爲GDP與相對政治權力的乘積。

<sup>5</sup> 權力轉移理論的先聲是透過GNP來衡量一國的權力，當經濟學界開始轉向使用國內生產毛額來衡量一國的經濟能力與表現後，權力轉移理論家從善如流，轉爲使用GDP來衡量權力。

<sup>6</sup> 國家實力綜合指數是由創立戰爭與關連計畫（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的學者David Singer所開創，這一指數綜整並加權了六個指標：軍費支出、軍事人員的數量、能源消耗量、鋼鐵產量、都市人口以及總人口。

究竟何時達到英國的80%至120%之間之時間點（timing）的判斷上卻存在著鴻溝。此處的關鍵是，美國對現狀的滿意度在十九世紀中期時至十九世紀末期時有明顯的提升，因此一個較符合權力轉移理論的發現應是，美國在十九世紀中末期在國力上逐漸追上英國，同時又對國際秩序滿意，雙方的互動因此成爲了當代和平權力轉移的典範。這一個說法只有在我們使用的是國力綜合指數來計算國力時才能成立（Rauch 2017, 649-650）。但是這也不代表國力綜合指數必然是更優越的指標。以GDP爲標準，中國當前的國力大約是美國的77%，但若我們以國力綜合指數來計算，中國的國力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與美國旗鼓相當，並在之後實現了超越。這個判斷顯然與學術界長久以來的研究發現扞格不入，也違反一般的經驗法則（Beckley 2011; Brooks and Wohlforth 2016）。這顯示了，無論使用何種權力的測量指標都可能遇到測量的估計值與理論或現實理解不相符合的問題，研究權力轉移的學者未來勢必要直面此一挑戰。<sup>7</sup> 一些近年來新發展出的指標提供了幾個可能的改進方向。Beckley（2018）認爲在探討國力時不能只看毛額，提倡應透過GDP與人均GDP的乘積來加以測量，前者代表了一國經濟與軍事產出的總量，後者則反映了經濟與軍事生產的效率。基於類似的理論考量，Anders, Fariss, and Markowitz（2020）提出了國內生產剩餘（Surplu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SDP）的概念，認爲GDP應被區分爲維持一國人民生存所必須的生計維持收入（subsistence income）及剩餘收入（surplus income），而只有後者才是國家能夠真正投入在國際關係互動上的權力資源。Carroll and Kenkel（2019）則是用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建構了一個爭端結果預期分數（Dispute Outcome Expectations Scores），並展示了這個分數更能夠反映出國家間軍事實力之對比與變化。

如前所述，權力轉移理論是透過相對權力的變化以及挑戰者對現狀滿意的

<sup>7</sup> 權力轉移理論學者一般對GDP作爲衡量一國權力大小的評價要稍高於國力綜合指數（Tammen, Kugler, and Lemke 2017）。但也有許多學者開始質疑，國內生產毛額在當今的社會當中是否還適宜作爲衡量權力的變數。跨國公司的實踐顯示，我們極難將生產及利潤歸於一個特定的國家（Starrs 2013）。同時，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方式明顯低估了創新以及以知識爲基礎的產業對經濟發展之影響（Brooks and Wohlforth 2016, 31-46）。

程度兩個自變項來解釋國際體系中是否會有大戰的爆發。權力轉移理論雖然並未在理論邏輯上宣稱權力增長的新興強國必然會滋生對現狀的不滿，但早期絕大多數的權力轉移理論家（例如Organski 1958; Organski and Kugler 1980）卻都沒有對現狀的滿意程度這個理論變數進行測量，甚至想當然爾地預設，支配性強權必然滿意現狀，挑戰者則必然不滿意（Lemke and Kugler 1996）。Vasquez（1996, 37）一針見血地指出，對現狀的滿意程度往往淪為權力轉移理論學者在理論無法適用時所訴諸的特設性解釋（*ad hoc explanation*）。其後果是，外界容易將權力轉移理論與結構決定論掛勾，認為權力轉移理論隱含了新興強國權力增加到達一定的程度時必然伴隨著對現狀的不滿足的前提。這點在權力轉移理論家陸續發展出量測對現狀是否滿意之指標後才得到了修正。

對現狀的滿意與否涉及對於由支配性強權所領導之國際體系內的現有規則的評估。對現狀滿意代表一國對既存的國際秩序所能給予其之利益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因此沒有推翻和改變現狀的意願；對現狀不滿意則表示一國認定從既存的國際秩序所能得到的利益不足或者不願意接受從屬的地位，認為現狀不公平且被敵對的勢力所宰制，推翻現狀的意念油然而生。研究權力轉移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指標來判斷一國是對現狀是滿意或者不滿意。Kim（2002）提出可用聯盟組合的相似度（*similarity of alliance portfolios*）來區分一國對現狀是否滿意。他主張挑戰者和支配性強權若有相似的聯盟組合，表示雙方擁有相似的利益，因此挑戰者應是對現狀滿意的；反過來說，若兩者的聯盟組合大相逕庭，則可以推斷兩者的利益不太一致，挑戰者對現狀並不滿意。Kim在這裡假設了國家會和利益契合的國家結為同盟，並避免和利益不一致的國家締結聯盟。權力轉移理論學者頗青睞此指標，在許多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其蹤跡（Hebron, James, and Rudy 2007; Sobek and Wells 2013）。這個指標雖然被廣泛使用，但亦有學者批評指出，由聯盟組合相似程度高推論到利益協調程度高固然合理，但挑戰者與支配性強權的聯盟組合相似程度低卻未必代表前者對後者或者現狀的秩序不滿，因為當挑戰者與其他國家利益重合程度夠高時，聯盟的形成即變得可有可無（Levy 2008）。

Werner and Kugler（1996）認為判定一國對現狀的滿意或不滿意必須檢視其軍事力量的擴張速度（*military buildups*），因為汲汲於整軍經武的國家較之

於沒有這麼做的國家更可能對現狀不滿。特別是，當一個新興強國的軍事擴張速度比支配性強權還快時，其顛覆現狀的意圖更是顯露無遺。除了比對挑戰者與支配性強權的國防支出外，Lim（2015）強調挑戰者在推動軍事現代化時，是否刻意增強牽制支配性強權權力投射之能力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Childs（2011）採用國際上主要的武器供應國的轉移情況來判斷一國是否為對現狀滿意的國家。他假設，武器的主要供應國不會將武器販售給他們認為對現狀不滿的國家，此無疑是養虎為患。

Lemke and Reed（1996）從國內政治的層次出發，強調挑戰者與支配性強權在國內政治制度性安排的一致性（特別是如果雙方皆為民主政體）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挑戰者對於現狀的滿意程度。在雙方的政體類型相同，甚至在經濟領域的制度安排都類似時，挑戰者通常能從現狀汲取到極大的好處。從這個角度出發，若一新興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政權類型不同，則可以推定其對現狀不滿。Tammen（2008）則強調關鍵是去評估國內的群眾是否滿意於經濟發展的利益分配。若國內的群眾對於經濟發展後的利益分配感到滿意，表示這個國家對於國際秩序的現狀也是滿意的。反過來說，若國內的群眾認為自己並非國內經濟發展的受益者或者被分配到的利益不足，他們對於國家的不滿也代表著該國對現狀的國際秩序的不滿。

Danilovic and Clare（2007）則是宣稱，強國間爆發衝突往往不是肇因於對國際體系中現狀秩序的不滿，而是在雙邊關係中是否有具體的利益衝突。他們爭奪的並非對體系的掌控，而是在他們認定為國家核心利益的議題上取得優勢。Danilovic和Clare的論點指出了一種可能性，即一個新興強國有可能由於一個具體的雙邊議題而對支配性強權不滿，但卻對國際體系的現狀秩序是高度滿意的。這表示，關於現狀的滿意程度可以有不同層次。在評估挑戰者對現狀的滿意程度時，我們至少必須關注兩個層次：第一，挑戰者對體系層次，亦即由支配性強權主導的國際秩序之滿意與否；第二，挑戰者對與支配性強權之間雙邊關係層次的秩序之滿意與否（DiCicco and Levy 1999）。

Sample（2018）關於對現狀滿意程度的討論就是建立在上面的雙層次架構。在體系層次，從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硬核（hard core）出發，她認為新興強國最念茲在茲的是，這一個國際體系的秩序是否能確保其極大化其財富。若

新興強國認為既存的國際秩序不允許其實現本身經濟發展之潛力，甚至可能打壓其發展，對現狀的不滿就會變得強烈；在雙邊關係層次，新興強國最看重的是其與支配性強權之間是否存有領土主權的爭端。許多學者發現，領土主權的爭端是讓雙邊關係升級到軍事化衝突的最重要原因（Senese and Vasquez 2008; Vasquez 2009; Vasquez and Henahan 2010）。當新興強國與支配性強權之間有未解的領土主權爭端時，新興強國對此雙邊的秩序應當是不滿的。綜觀現存所有測量一國對於現狀滿意程度之指標，Sample的作品頗有理論深度，也最具進一步發展之潛力。這是因為，她指標的建構完全根據理論的指引，並仔細討論了一國究竟想要從國際體系中的現狀或謂國際秩序中得到什麼，以及在雙邊層次的關係中想要確保什麼。很明顯，Sample觸及了物質層面的核心，但如同Greve and Levy（2018）所指出的，挑戰者對現狀的不滿未必只來自於物質層面，他們因而特別強調地位（status）的追求如何可能催生出挑戰者對現狀的不滿。Chan（2020）更進一步，揭露了權力轉移理論的理性偏見（rationality bias），並特別強調妒忌、憤怒，及憤恨等情感（emotions）的作祟如何可能使一國對現狀產生高度不滿。

後續的研究還應當思考的是，如果不同的指標捕捉到了對現狀不滿意的不同層面，我們又該如何在去蕪存菁後，將它們構造成一個整合性的指標。權力轉移理論發展至今，已經不再是以結構決定論為基底的理論，其中的關鍵就在於更加突出了對現狀的不滿意程度的重要性，強調相對權力的接近不必然帶來軍事衝突，而要看支配性強權如何與挑戰者互動，從而塑造其對現狀的滿意。<sup>8</sup>正如Tammen（2008, 320）所稱，支配性強權應嘗試形塑潛在挑戰者的政策偏好，如此一來即使其相對權力衰弱，與挑戰者之間呈現權力均勢的態勢時，軍事衝突爆發的可能性也得以大幅下降。權力轉移理論學者進一步提醒，挑戰者政策偏好的形塑不能靠威脅、禁運或制裁，這些政策只會適得其反；支配性強權必須要社會化（socializing）挑戰者，即將其置於由國際義務及多邊關係結構所構成的綿密網絡之中，進行產生約制效果及路徑依賴。這一個網

<sup>8</sup> 即使如此，還是有學者認為權力轉移理論過於強調結構，對於能動性（agency）及偶然性（contingency）的關注不足（Chan 2020）。

絡的基礎便是支配性強權所能接受的原則與規範（Tammen et al. 2000; Tammen and Kugler 2006）。欲判斷支配性強權社會化挑戰者的努力之成效，我們最終仍須回到評估挑戰者對現狀的偏好程度，因此持續發展測量現狀不滿意指標將是重中之重。

## 肆、戰爭爆發條件與對理論的挑戰

作為一個解釋戰爭爆發條件的理論，權力轉移理論的基本論斷是支配性強權對現狀滿意，因而不存在先發制人的動機，國際體系層級的戰爭只有在出現了一個對現狀高度不滿意的挑戰者，並對支配性強權發動挑戰後才會爆發。在這個論斷上，學者又開展了幾個軸線的討論，當中主要涉及的議題包括：

1. 支配型強權必然對現狀滿意嗎？
2. 支配性強權不會發動預防性戰爭嗎？
3. 挑戰者發起挑戰的時機點究竟為何？是在超越前還是超越後？

針對第一個議題，Steve Chan在一系列的著作中都嘗試論證，支配性強權未必只想確保現狀的存續，崛起國也未必總是胸懷顛覆現狀的大志（Chan 2004; 2020; Chan et al. 2021）。Chan還進一步運用了心理學中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來解釋為何支配性強權在權力衰退時可能採取風險程度高的政策，從而破壞現狀的秩序。他以美國的外交政策為例，指出美國作為支配性強權，卻多次採取了衝擊現有國際秩序的政策，印證了其所指出的，支配性強權也可能對現狀不滿意。至少，對現狀的不滿意不應被視為崛起國的原罪（Chan 2020）。

支配性強權究竟是否會先下手為強？Jack Levy指出，當支配性強權意識到未來可能出現一個威脅時，便可能會在這個潛在的未來威脅還沒有比自己強大前先發制人（Levy 1987; DiCicco and Levy 1999）。權力轉移理論學者從經驗及理論挑戰了這個說法，堅持其支配性強權不會發動預防性戰爭的判斷。Lemke（2003）指出，支配性強權發動預防性戰爭的事例在歷史長河中屈指可數。Tammen et al.（2000）則提供了這個現象的理論性解釋，強調支配性強權不會發動預防性戰爭，因為此舉將大大損害其苦心建立的國際建制並可能讓其

與滿意現狀的國家所組成的聯盟土崩瓦解。換言之，國際秩序是由支配性強權打造而成，而戰爭可能會造成現行國際秩序的毀滅，對現狀的滿意因此讓支配性強權喪失了發動戰爭的動機。其次，一國即使在戰爭中被擊敗，往往只需要二三十年的時間便可浴火重生，此即所謂的鳳凰效應（*phoenix effect*）。換言之，支配性強權即使對挑戰者發動了攻擊，其也可以很快重振旗鼓，因此支配性強權從根本上就失去了先下手為強的誘因。

關於挑戰者發動挑戰時機的問題上，雖然權力轉移理論家普遍認為挑戰者會是動手一方，但對於其究竟何時會付諸行動，是在權力對比產生黃金交叉前或後，仍莫衷一是（*Tammen et al. 2000, 21-22, 28*）。至少我們發現，權力轉移理論出現過論點上的跳躍。*Organski*（1958, 333）先是宣稱，其發現挑戰者似乎大多是在權力還未超越支配性強權時（亦即挑戰者的權力處於支配性強權的80%至100%的區間時）就發動戰爭。不過由於這個論述是從有限的經驗事例得出，因此在進行更大規模的經驗分析後，他與門徒*Kugler*改弦易轍，轉而主張挑戰者事實上是在權力已經超越原有的支配性強權後才會訴諸戰爭（*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chap 1*）。

## 伍、討論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新興理論框架

權力轉移理論的理論原型搭建在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互動框架上，但該理論的核心關切是兩者互動時最可能發生戰爭的情境條件為何。針對兩者的策略選擇，權力轉移理論的關注有限。<sup>9</sup>在這個理論框架中，支配性強權的策略選擇在本質上即是被動因應來自崛起國發起的挑戰。其次，權力轉移理論固然有針對對現狀不滿意程度提出測量的指標，但對於崛起國基於什麼樣的考慮而選擇與支配性強權展開競爭或合作的討論仍是不足的。從2017年以來，有不少學者開始填補這塊文獻上的缺漏，對崛起國與支配強權的策略選擇進行理論性的探討。雖然不以權力轉移理論為旗幟，但這些學者的作品和權力轉移理論一樣，完全緊扣著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戰略互動的主旋律。這些作品可以被大

<sup>9</sup> 在以下所討論的理論文獻中，諸位學者往往發展自己偏好的類型學（*typology*），並在此基礎上討論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在進行戰略互動時所能採取的策略。

略區分為三類：第一類解釋的是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採取的策略；第二類分析的是支配性強權如何因應崛起國或自己的衰退；第三類作品則是把兩者戰略互動的策略集合作為分析單元（unit of analysis）。以下，我們將依序討論這三大類作品，並把重心置於這些作品所凸顯的理論因素。

## 一、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策略選擇

我們首先解析崛起國面對支配性強權的策略選擇，並引介兩個理論。第一個理論是由現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Rush Doshi所提出，第二個則是Joshua Shiffrinson搭建的「掠奪理論」（Predatory Theory）。Doshi（2021）嘗試解釋崛起國將如何因應支配性強權所建構的霸權秩序（hegemonic order），並抽繹出兩個關鍵的變項：第一，崛起國對與支配性強權間權力差距之認知；第二，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威脅認知。兩者的權力差距決定了支配性強權對崛起國利益構成損害的能力，威脅認知高低則代表崛起國認為支配性強權有多可能會對其造成傷害。當崛起國的國力與支配性強權仍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時，若對支配性強權的威脅認知不高，崛起國將對支配性強權採取順應（accommodation）之策略，大體上支持支配性強權之領導，甚至願意容忍或支持支配性強權在區域的軍事性存在。若權力差距大，感知到的威脅也大時，崛起國會訴諸削弱（blunting）策略，嘗試弱化支配性強權在軍事、政治及經濟上的控制權。當崛起國的力量大幅逼近支配性強權，兩者的差距有限時，崛起國若有較高的威脅認知，會嘗試結合強制性及勸誘性的手段來厚植其對區域內國家的控制力，這即所謂強化（building）策略。若權力差距相差不大，崛起國又不認為支配性強權會特別對其構成威脅時，崛起國便會大張旗鼓地採取優勢（dominance）策略，即以強制性手段為主，勸誘性手段為輔的方式，宰制區域內的國家，建立一套排除支配性強權的區域秩序。綜合來看，相對權力差距的縮小和低度的威脅認知將對支配性強權的霸業造成最大程度的斷傷，權力差距的維持和較低程度的威脅認知則較能確保支配性強權霸業的維繫。<sup>10</sup>

<sup>10</sup> Doshi此處所提及的削弱、強化以及優勢策略非常類似於Timothy Crawford（2021）所

將Doshi的理論與權力轉移理論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兩個理論都預期了當新興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權力差距縮小時，新興強國作為挑戰者就有可能對現狀發起衝擊，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此時的關鍵在挑戰者對現狀的滿意程度，Doshi則主張挑戰者對支配性強權的威脅認知可能更為重要。無論如何，Doshi的理論預設了，崛起國在支配性強權陷入衰退，兩者的相對實力拉近時，必然會選擇挑戰支配性強權已經建立起之秩序，威脅認知的高低只會影響挑戰之強度。從這個角度看來，Doshi的理論結構決定論的色彩比權力轉移理論更加濃厚一些。

Shifrinson (2018) 反對崛起國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打擊衰退國這個論斷。他強調若崛起國認為支配性強權具有戰略價值 (strategic value)，則崛起國不僅不會追求弱化支配性強權之政策，甚至會選擇支持支配性強權，減緩其衰退。在預設了崛起國是國力持續增長，支配性強權處於國力衰退的前提後，Shifrinson提出了兩個理論變項來解釋崛起國會對支配性強權所採取之策略：第一，支配性強權的戰略價值；第二，支配性強權的軍事態勢 (military posture)。前者將決定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策略方向，即基調是以弱化或強化為主，後者則影響了策略的強度。國際體系的極性 (polarity) 及支配性強權相對於其他大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都可能影響崛起國對支配性強權的戰略價值高低的判斷，更為重要的是，崛起國會檢視支配性強權是否會對其提供政治支持，協助其排除在崛起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阻礙。若支配性強權能夠在崛起國的崛起之路中起到正面的作用，崛起國將肯認支配性強權之戰略價值，採取偏向支持性 (supportive) 的策略方向。再來，崛起國會判斷支配性強權之軍事態勢，若支配性強權現有的軍事實力在質與量方向都不足以支持其遂行必須的軍事行動與目標，崛起國便會選擇強化 (strengthening) 策略，大力支持衰退中的支配性強權。若支配性強權的軍事態勢仍堅如磐石，崛起國則會採取支撐 (bolstering) 策略，有限地提升支配性強權之權力。反之，若支配性強權對

---

稱之離間策略 (wedge strategy)，即是透過強制或者籠絡性的手段來阻止對己不利的同盟體系之形成。Chai (2020) 便指出，中國試圖對澳洲採取離間策略以弱化美澳之間的聯盟關係。

崛起國之崛起構成阻礙，例如選擇與崛起國的對手聯盟，崛起國便不可能認可支配性強權之戰略價值，因而會選擇掠奪型（predatory）的政策，削弱支配性強權。此時支配性強權的軍事態勢將決定崛起國掠奪其之強度。支配性強權的軍事態勢越弱，崛起國越可能對其展開高度強制性的壓制手段，以讓支配性強權以更快的速度跌落強國之林，此即所謂降級（relegation）策略。假如支配性強權的軍事姿態仍強，崛起國就只能祭出弱化（weakening）策略，以間接與逐步的方式來削減支配性強權的權力。這樣看來，當支配性強權的戰略價值低，且軍事態勢不強韌時，挑戰者會對支配性強權發起最劇烈的競爭性政策。當支配性強權的戰略價值高，且軍事態勢不強韌時，挑戰者則會戮力維繫支配性強權之國力於不墜。

Shifrinson的理論分析揭示了，當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的國力接近時，競爭激化和合作深化都是可能出現的均衡。要進一步解釋雙方具體互動情況，我們必須仰賴權力對比以外的因素。接著我們換個視角，轉入支配性強權面對崛起國的策略選擇。

## 二、支配性強權對崛起國的策略選擇

Copeland（2000）以及Levy（1987）在著作中指出了由於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之間的權力對比通常往對後者不利的方向變化，因此支配性強權普遍具有強烈的預防性動機，會在情況還對己有利時出手，且不會輕易放棄霸業。Stacie Goddard以及Paul MacDonald與Joseph Parent的著作挑戰了這些論點。

Goddard（2018）強調支配性強權有時會接納崛起國的崛起，有時則會堅決遏制崛起國，結果如何，完全取決於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legitimation strategy）是否奏效。正當化策略的內涵具體來說是指崛起國合理化其行為，並向支配型強權解釋自己的目標及意圖之策略。總體來說，當正當化策略取得成功時，支配型強權會包容崛起國，當此策略失敗時，支配性強權會選擇打壓崛起國。Goddard認為，兩個理論變項解釋了支配型強權在多大程度上會接受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第一，支配性強權的制度脆弱性（institutional vulnerability）程度；第二，崛起國的多聲性（multivocality）程度。前者指的是支配性強權所建構的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是否有弱化或

崩潰之虞，或者堅韌如往昔。後者則是看崛起國是否具備同時觸及國內與國際的眾多受眾，並能夠援引當時國際社會中的規範原則或普遍的實踐來加以說服。當支配性強權建構的國際建制處於危機，即制度脆弱性高時，支配性強權會迫切需要其他國家的聲援與支持，若此時崛起國的多聲性程度高，表示其能在國內及國際引伸國際社會中業已存在的規範與原則，將對搖搖欲墜的國際規範體系帶來莫大幫助，因此支配性強權會對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產生相當大的共鳴（strong resonance），進而選擇順應崛起國的崛起。倘若國際建制不再堅韌，崛起國的多聲性又低，表示其沒有援引相關的原則來鞏固既有的規範體系，這時支配型強權會將崛起國視為具有強烈推翻現狀傾向的革命性國家（revolutionary power），拒斥崛起國的崛起，認定必須採取強制性的政策以及高度競爭性的大戰略以有效壓制崛起國。至此，我們勾勒了支配性強權最能以及最不能接受崛起國正當化策略的兩種情境，它們都涉及了既存的國際建制不穩的情況。由於現況下的國際建制不穩，Goddard認為支配型強權容易因此輕信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或者忽視其正當化策略也有可許之處。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其他兩種情境則是在建立在支配性強權建構的國際建制穩如磐石的前提上。

當支配性強權主導的國際建制沒有遭逢巨大挑戰，支配性強權對崛起國正當化策略的接受程度不會是最高或最低，而是會居於其中。若崛起國多聲性程度高，由於支配性強權沒有迫切需要崛起國來協助其護衛現行國際建制的需要，因此只會對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採取部分接受的態度，也就是Goddard所謂的弱共鳴（weak resonance）。此時，支配性強權會尋求更多的資訊來判斷崛起國之意圖，並最可能採取避險的策略。假設崛起國的多聲性程度低，支配性強權便不可能與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產生多大的共鳴，但由於國際建制沒有弱化之虞，因此也不需要過度悲觀地解讀崛起國之意圖，利用國際建制及聯盟制衡之即可。Goddard的理論點出了決定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之間關係的重點在於支配性強權對現狀秩序脆弱程度的評估，以及挑戰者採取了何種的言辭策略（rhetorical strategy）來詮釋自己的崛起。支配性強權對挑戰國發動預防性戰爭只是兩者互動時的一種可能性，支配性強權未必一直都存有採取預防性作為的強烈動機。這個動機只有在支配性強權產生了現狀的國際建制秩序正在瓦

解中的危機感且崛起國又不擁有較高的多聲性時才會生根茁壯。在這個視角下，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之間的權力對比變化只是背景因素，不在根本上決定兩者互動的過程與結果。

MacDonald and Parent (2018) 不直接從支配性強權對崛起國之策略入手，而是試圖對衰退中的強權如何因應權力衰退之挑戰做出解釋。現有的一些文獻指出支配性強權願意付出高額的代價來護衛自己建構的秩序，試圖直接扭轉相對權力變化的不利發展。面對衰退，支配性強權先天的傾向是加碼競爭 (Gilpin 1981)。MacDonald and Parent (2018, 22) 主張，從歷史的經驗來看，衰退中的強權其實會選擇戰略縮減 (retrenchment)，即權宜地選擇削減防衛上的開支並限縮安全上的承諾，不強行在權力下降時與崛起國進行劇烈的安全競爭。衰退的程度與戰略縮減的強度成正比，即衰退的程度越高，戰略縮減的強度也越高。戰略縮減是衰退下的理性選擇，目的是在減少戰略資源的支出後，穩住國力，接著再透過必要的改革重振實力，並在需要時重新投入與崛起國的競爭。MacDonald和Parent提出了四個可能影響的調節變數：第一，相對權力位置 (relative rank)；第二，同盟可得性 (ally availability)；第三，承諾的互賴程度 (commitment interdependence)；第四，征服的計算 (conquest calculus)。

首先，若強權所處的相對權力位置越低，戰略縮減便是一個必然的選項，因為此類強權較可能面臨多重威脅的困境。反之，相對權力位置越高，戰略縮減會變得較為困難，畢竟此類型國家享有一定的權力優勢，但戰略縮減仍不失為一個選項。其次，同盟的可得與否同樣會影響強權的戰略縮減決定。當有可靠且目標一致的盟友時，強權較可以放心地選擇戰略縮減。若同盟不可得，衰退中的強權就未必擁有採取戰略縮減的空間，恐怕得苦撐待變。再來，強權對其他國家甚至各個區域的安全承諾若是相互獨立的，較能夠採取戰略縮減，因為不需要顧慮其他國家可能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 (domino effect) 之憂慮。但若強權做出的安全承諾皆是環環相扣，彼此相關，戰略縮減就變得困難。最後，當征服和控制新佔領土十分困難時，強權會有比較高的安全感，較勇於採取戰略縮減之政策，但當征服和控制新佔領土並不困難時，強權將極難克服戰略縮減可能導致安全程度下降之恐懼。按照MacDonald和Parent的理論，支配

性強權可能選擇戰略縮減之政策，但其機率必然比其他不處於權力頂端的國家要低。若相對權力優勢的因素沒有讓支配性強權卻步，仍考慮戰略縮減，進一步要檢視便是支配性強權的聯盟組合以及國際體系中的攻守平衡。無論如何，MacDonald和Parent點出了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支配性強權有可能選擇不與崛起國立即開啓劇烈的安全競爭。

### 三、崛起國與支配性強權的策略集合

與上述我們引介的作品不同，David Edelstein（2017）的理論嘗試同時解釋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的策略選擇，並把兩者選擇的策略集合作為主要的分析單位。具體來說，Edelstein主張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的策略選擇都可以從它們在時間視野（time horizon）上的長與短來加以解析，並強調國際關係大多數的研究中都忽略了時間的作用。<sup>11</sup>時間視野的長短取決於一國在多大程度上擔心自己當前的選擇是否會對未來產生影響。時間視野長代表行為者非常在意當下選擇的未來後果，時間視野短則表示較沒有這種顧慮。對支配性強權來說，較長的時間視野代表從現在開始就要與崛起國競爭，因為崛起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長期威脅，任何當下的寬容都可能變成未來的遺憾。因此，一個擁有長時間視野的支配型強權會選擇遏制崛起國，與其展開激烈的安全競爭。若支配型強權的時間視野較短，表示一個長期威脅之形成並不在其考慮之內，這表示支配性強權可能會選擇與崛起國合作，以取得合作紅利，或者和崛起國協作來打擊共同威脅。對崛起國來說，長的時間視野代表至少在短期內避免採取可能觸怒支配性強權之行動，選擇與之合作，畢竟時間站在崛起國這一邊。崛起國的時間視野若短，則可能會忽視擴張性政策的未來後果，在短期便急於將新增之實力轉換成影響力甚至追求領土的增加，這些政策可能都會激烈雙方之間的競爭。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在Edelstein的理論框架下，同樣的時間視野對支配型強權與崛起國產生的效果並不相同。較長的時間視野會催生出支配性強權較為競爭性的策略，但卻會讓崛起國傾向採取合作性的策略。較短的時間

---

<sup>11</sup> Copeland（2000）是一個明顯的例外，在他的理論中，對未來的預期扮演重要的角色。

視野讓支配性強權選擇合作，然而卻可能促使崛起國選擇擁抱競爭性的政策。

把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的兩種時間視野的可能性結合，Edelstein指出，當支配性強權和崛起國都擁有較長的時間視野，或者支配性強權的時間視野長而崛起國短時，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帶來戰爭風險的提升。若支配性強權和崛起國的時間視野都較短，則雙方互動的情況是小規模衝突和務實合作皆有可能。當支配性強權擁有較短的時間視野，崛起國的則較長時，則創造出了非常有利於合作的條件。崛起國和支配性強權的相對權力接近時也不必然代表雙方的戰爭可能性的驟增，Edelstein的理論清楚地展示了，這樣的權力結構只有在雙方時間視野組合符合特定的型態時才會導致大規模的衝突。

總體看來，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的決策對衝突發生的可能性在不同學者的理論框架中具有不同的權重與判斷，這表示了權力轉移與衝突之間的連結可能存在多元的機制（mechanisms）。進一步來說，權力轉移理論以及此處所討論的新興理論清楚指出，僅僅關注相對權力變動，未必能對霸權競爭提供充分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視角往往伴隨著悲觀的結構必然導致衝突之宿命式的論斷。許多學者提出諸如現狀的滿意程度、正當化策略以及時間視野等理念性的運作機制，其重點便在於點出，這些因素有可能在初始的階段就決定了雙方關係的基礎會是以競爭還是合作為主。競爭與衝突固然可能，但我們也不應否定合作與穩定關係開展的機緣。

## 陸、歷史與國關：源起

當代的美中霸權競爭尖銳地刺激著國際關係學界，要求其提出能解釋此一現象的理論觀點。在上述對於霸權競爭文獻的討論當中，我們發現權力與理念（包括對現狀的滿意程度）形成了兩條主要的線索，對於逐霸行為提出了不同的理論解說。不過這個文獻的時間縱深是有限的，它通常不會太關注前現代的國際關係史，然而歷史卻是我們可以擴展視野、採擷案例，發展理論的重要場域。國際關係與國內政治不同，在國際關係中，無政府的環境自古至今沒有改變，因此國家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具有跨越時間的一致性；然而在國內政治，體制的變動卻大大改變了整體的格局，使得古今的國內政治行為較不容易放到一

個框架中來理解。因此在研究國際關係時，將歷史含括進來，作為發展理論的素材，就具有極大的意義。對於崛起中不停回顧長歷史的中國大陸而言，掌握其歷史行為更具有特殊的含意。這個理解把我們帶到「歷史與國關」的領域。

歷史是發展國際關係理論的素材，而國關理論則提供了深入理解歷史的途徑，這兩者本應該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在學術研究中，歷史和國際關係卻不是緊密相連的兩個學科。史學的方法論自然是源遠流長而自成系統，當代的國際關係研究則深受政治科學的影響；歷史研究是人文學的主幹之一，而國際關係則是社會科學的一支。雖然歷史和國際關係在現實上是如此緊密相連，但是在學術上卻是畛域分明，各屬一端。學門的鴻溝導致相互取經的困難，使得「具有歷史認知的國際關係研究」（history-inform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難以成形。結果國際關係理論經常是「非歷史的」（ahistorical）和「去脈絡的」（decontextualized）。以這樣的國際關係理論來理解世局，只可能是窄淺和不足的（吳玉山 2018）。

國關理論經常有超越時空的宏圖，並以不受限於歷史情境來彰顯其科學性。這樣的心理態度容易讓國關理論的建構者遠離歷史。當然非歷史的心態並非舉世皆然，不少歐洲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是和歷史整合在一起的；另外，「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也相當強調歷史的重要性。然而美國的國際關係研究卻基本上比較不重視歷史，充其量只是把史事當作製造大數據的原材料，而不願意真正進入其中抽絲剝繭、探詢意義。

承襲著美國的傳統，在台灣的國關學界一般與歷史學界劃清界限，甚少交流。這兩個學科彼此不甚瞭解對方的方法論和興趣，也很少認為有可向對方請益之處。過去歷史與國關很少透過合作來探索共同有興趣的主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兩分與隔絕，在此顯現無疑。然而，一個重大議題的出現，突顯了國關與歷史分隔的困境，也促使雙方學者開始探索合作的可能。這個議題就是「中國的再起」（the resurgence of China）。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崛起對於國際體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然而這並不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中國曾經長期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帝國，其政治與文化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對東亞地區更是如此。在歷史上中國曾經多次分裂衰微，而又振興再起。對於想要瞭解今日中國大陸對外行為的人們而言，從中國

歷史中尋找線索是極為自然的。

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以及美中之間日益嚴重的衝突，Graham Allison以西方的歷史案例演繹支配性強權與崛起國之間的權力轉移理論，推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認為爭霸不免一戰，成為國關學界的顯學。Allison並將其歷史識見一般化，探究了近500年以來的重大權力轉移，發現有大概率的戰爭出現機會，並將此一結論直接適用到美中今日的爭霸。這讓我們不禁問到，如果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能從歷史取經，在台灣的研究者豈不最能夠從歷史來深入地看今日的中國崛起，這顯然是一個重大的學術利基。

中國今日的興起其實並非單純的大國崛起，而是「再起」。根據著名史學家王賡武的看法，這是繼秦漢、隋唐、明清以來的第四次（Wang 2004）。向前現代的歷史經驗探求中國對外關係的線索是極為自然的（Callahan 2012）。<sup>12</sup>台灣的學術界對於中國歷史的理解是極為重要的學術資產。台灣的國關學者自然應該要努力開發跨學門的合作機會，努力探究中國對外行為的模式，並增益國關理論。這就催生出台灣的「歷史與國關」研究，希望能夠向歷史與史學取經，並與國際上研究歷史與國關的學術社群結合，共同加入美中間霸權與競爭的研究。

## 柒、文獻分類：跨時與跨域

在歷史與國關的文獻當中，可以用著作是否跨越時間（跨時或限時）與是否跨越區域（跨域或限域），而區分為四個向度（參見圖一）（Wu 2018）。非一般化的國關史研究是屬於限時限域的（左下），其研究目的是為了深入瞭

<sup>12</sup> 從中國的歷史來探求中國對外關係的線索是有前提的，即中國跨越古今持續性的存在，這使得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具有可比性。今世許多國家未必具有此一特性，但是中國的古今可比性是相當高的。在客觀方面，中國的核心領域自始相當確定並逐漸擴張（中原）、歷代均致力於建立承襲過去的正統並極為重視歷史、文化的延續性高（相當程度透過其獨特的、與語音相對獨立的文字系統），而經典古籍與思想脈絡傳承性也強。在主觀方面則民衆普遍接受歷史與文化的延續性，即使因為政治的因素出現一時的逆反也無法改變一般與長期的趨勢。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其古今的可比性是較強的。不過此處還需要更紮實的論證，以確認歷史在當下的意義，這也是歷史與國關研究所面對的挑戰之一。

圖一 歷史與國關文獻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解歷史的特定案例，並沒有跨越時間或跨越區域的理論企圖，這一塊主要是歷史學的研究範疇。<sup>13</sup>如果保持限時的觀點，但是走入跨域的研究（左上），那麼就必須探究跨域的機制為何。科技在此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在對於古代農業帝國的研究當中，一定的物質生產力與軍事能力（冷兵器）使得國家向外投射權力的型態與範圍受到一定的限制，也使得這些前現代國家的國際關係與當代的國際關係可能出現質的不同，這一塊主要是屬於歷史的比較研究。<sup>14</sup>如果進入跨時的領域（即圖一中右側的兩個向度），則歷史與國關可以大別為兩個

<sup>13</sup> 例如陶晉生對於宋遼關係以及南宋與金關係的討論，雖然也有省思整個傳統中國對外關係的想法，但實際上就是深入探討宋遼金的國際關係，是典型的國際關係史研究。參見陶晉生（2013）。

<sup>14</sup> 例如對於羅馬與漢這兩個在公元前後歐亞大陸上主要農業帝國對外關係的比較，就是典型的跨域而限時的研究，參見Bang（2010）。當然科技對於國際關係最重大的影響可能是發生於核子武器出現之後，其主要的機制是經由「相互保證毀滅」與「延伸嚇阻」所帶來的恐怖平衡。參見Waltz（1981）。

範疇，一是主流的普適論（右上），強調國關理論可以跨時跨域，因此可以藉由古今不同區域的歷史案例來檢驗與修正既有的理論；一是特殊論（右下），這是認為一個區域或國家有其特殊性，而此特殊性可以跨時傳遞，因此古今國際關係可以相互貫通、印證發明，但是卻無法跨域產生作用。在文獻當中所點出最重要的跨時機制是意念與文化。普適論（右上）與特殊論（右下）是歷史與國關中最主要的兩個研究向度，而此二者的論辯也構成了文獻中最為活躍的主題。

站在普適論（圖一的右上）的立場，國關理論可以跨越時空，對不同國家的對外行為提供解釋，並冀圖以不受限於歷史與區域來彰顯其科學性。普適論中最佔優勢的途徑就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的門派有多種，攻勢與守勢的看法不同、結構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對分析層次的著重與堅持也不同，但是論到兩強逐霸對於體系穩定所帶來的影響，現實主義中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傳統的權力平衡典範與權力轉移典範，前者認為權力均衡是維繫體系穩定的前提，後者則視不受挑戰的霸權為國際和平的基礎。

Allison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權力轉移典範的代表性理論，其基本假設為穩固的支配性強權是體系和平的基礎，而挑戰者與支配性強權的國力接近則容易導致兩強間的衝突。在Allison的推論過程當中，透過史例所建立的國關理論跨時跨域地直接適用到當今的美中關係，堪稱歷史與國關文獻中普適論的典型。究其實，修昔底德陷阱是以歷史案例研究的方式驗證Organski在1950年代就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不過日後該理論的發展多採取非歷史的視角，而著重於搭建出一個實證的量化模型，如前所述（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吳玉山 2010）。Allison用歷史的角度重新詮釋一個已經存在多時的國關理論，搭配現實政治中不斷加劇的美中爭霸，結果引起了學術界與政策圈的高度關注。

在國關理論當中，相對於強調物質權力的現實主義，一向有強調理念的理想主義及自由主義與之相抗，後來又有建構論的出現，從本體論與方法論等各種角度對現實主義進行批評。在歷史與國關的文獻當中，這些看法集結為特殊論，強調理念與文化的重要性。很明顯地，如果理念與文化可以扮演制衡、甚至壓倒物質利益的角色，而文化又具有延續性，則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就可以跨越時間來理解，將古今相互觀照。但是這樣的文化系統卻不能夠跨越地域，

適用到異文化的國度。在圖一當中，文化義理是作為跨時的機制，使得歷史與當代發生聯結，讓前現代的國家行為成為理解當今國際關係的鑰匙；但是文化義理卻無法跨域，事實上它是封閉異域的門鎖（圖一的右下）。

由於文化義理是特殊論的核心，因此究竟中國文化中影響對外行為的是什麼，就成為特殊論的起始點。在這一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朝貢體系」、「天下體系」、「儒家和平論」、「道義現實主義」，與「關係理論」等（陳欣之 2018）。朝貢體系是傳統東亞國際社會的特殊體制，被認為出於獨特的中國文化系絡，為層級的制度安排提供合法性，可以滿足國家的安全需求，並提供紛爭解決的機制（Fairbank and Teng 1941; 濱下武志 1999）。就天下體系而言，是強調一個在共同秩序下的世界體系，具有高度的含括性（all-inclusiveness），能容忍分歧、不再歧視，並廣被東亞，可為世界治理的哲學（趙汀陽 2011; 趙汀陽 2015）。儒家和平論認為儒家的層級體系能長時期保證東亞的和平與安全，其遏制戰爭、保障和平的效果超越西方的西伐利亞體系（Kang 2003）。道義現實主義強調正義、層級、規範等傳統現實主義當中所欠缺的元素，突出領導能力和戰略信義對於大國崛起的重要性（閻學通、張旗 2018）。關係理論認為國家如同個人，在判斷情勢、採取行為時會意識到在國際社會關係網絡中的位置。對於關係的重視是基於歸屬的需求和群性，此乃根深蒂固。國家的決策會反映維繫關係的意圖，從而會實行自我克制，因此國家行為無法僅從現實利害來加以理解（Qin 2018; Huang and Shih 2014）。在特殊論的倡議者當中，秦亞青、閻學通與趙汀陽等中國大陸的學者主張建立「中國學派」，標舉其獨特的學術位置，並發展影響力，使其論述與中國當今的對外政策產生了關聯。總體而言，這些特殊論者由於強調文化義理的本身，因此在歷史案例的耙梳上普遍較為缺乏，Kang的論述則是一個顯著的例外（Kang, Shaw, and Fu 2016; Kang and Ma 2018; Kang et al. 2019; Kang 2020）。

## 捌、文化的角色：普適vs獨特

在歷史與國關的文獻當中，當討論到中國的對外行為模式時，最為關鍵的理論問題是：「究竟中國的對外行為有多少是受到其獨特文化的影響？」對許

多國際關係學者而言，一般的傾向是認為存在著普遍適用的理論，可以跨時跨域地解釋中國的對外行爲；但是也有許多理論家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認為中國的對外行爲不透過探究理念便無法加以理解。這就構成了普遍論與特殊論的爭議。很明顯地，如果要了解中國對外行爲的根源，我們不能只倚賴一種途徑，而是必須透過這兩種理論的對話。

在歷史與國關的文獻當中，多數的學者都認為中國有獨特的文化傳統，而此一傳統與儒家等在歷史中佔有優勢地位的思想體系有關。在此種情況之下，透過歷史案例的檢證，來看當文化義理與現實利害衝突的時候，究竟何者居於更重要的地位，便成為特殊論與普適論交鋒最常見的形式。對普適論而言，其目的是透過史例來證明既有的國關理論（不論是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典範）便可充分地解釋中國的對外行爲，不需要引入文化的變項，或是證明文化理論對於中國行爲的假設不成立，這可稱為「文化無關」論（Wang 2011；萬曉2020）。有一些學者承認文化義理的重要性，及其對於國家行爲的影響力，但是認為文化義理其實是特定權力分配下的產物，於是文化成為中介變項，權力才是真正的自變項。例如朝貢體系就被視為東亞長期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制度安排，其根源是中國居於絕對優勢的權力地位（Wang 2013）。此種論述不啻用現實主義吸納了義理制度，使得解釋的重心越過文化的迷障，歸於基礎的權力分配，也就是用權力含括理念，可稱為「現實含攝文化」論。

對特殊論而言，研究者經常試圖證明傳統的西方現實主義理論無法「完全地」解釋中國的特定對外行爲或是行爲模式，因而必須引入具有歷史與文化特色的思想體系作為「救援」或「補充」。這樣做的結果自然不是否認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效力，而只是提出理解文化與思想的重要性。於是兩種理論的爭論變成了解釋程度大小的爭論，而非全有與全無的辯難。在不同理論均有其效力的情況之下，做相對解釋能力的判定自然會較為困難。此種策略可以視為將權力與理念「分配並列」。另外一種策略是「階層滿足」，認為國家追求不同層次的目標與價值，其中安全與生存是最基本的，而文化則定義其高層的價值，唯有當基層的目標獲得滿足的情況之下，國家才會追求高層的價值。現實主義或可決定了中國在追求基層目標時的行爲模式，但是當中國的安全與生存確保的情況下，它會追求文化（例如儒教文化）所定義的高層價值，例如依據

關係的親疏遠近來決定中國與他國的互動模式（蘇軍璋 2018）。

歷史與國關的研究，雖然至今已有相當的發展，但是也面臨一些侷限與挑戰，而必須加以面對與解決。這些侷限與挑戰包括，第一、要瞭解普適論或是特殊論哪一種較有解釋力的前提，是必須確認理論本身。所謂西方的普適論經歷了多次重大的爭辯，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論戰迄今未決。在此種情況之下，究竟西方的普適國關理論為何，顯然並非不證自明。由於現實主義的理論發展較為源遠流長，基本規律較為清晰，因此在歷史與國關的研究中提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時，主要是採取了現實主義的一般性原則、或是其中的某一流派，例如權力轉移典範。但是畢竟權力轉移論不是現實主義的全部，而現實主義也不是西方普適國關理論的全部。在做理論對話時，既要抓住焦點，也不能不見全局，這是一個挑戰。歷史與國關和權力轉移論的對話，對於發展整體的國關理論，究竟帶有怎麼樣的意義，值得研究者思考。

第二、另一個相對應的侷限就是何為文化特殊論的解釋框架。例如研究者經常將「天下觀」和「朝貢體系」作為中國文化與制度特色的代表。然而這樣地理解中國是否合理？「天下觀」有各種不同的詮釋，而「朝貢體系」是否如論者所稱長期穩定的存在也是可辯論的議題，所以此一中國式的解釋框架並不是沒有爭議的。或者我們需要更多地歸納史例，來解析中國的對外行為模式，而不是單純訴諸於思想史的研究。畢竟，我們所在意的，是實際的行為模式，而不是外宣的思想框架。

第三、如何判明哪一種理論更有解釋力？這是一個研究設計上的問題。在上述普適論與特殊論的辯論當中，在普適論中有「文化無關」與「現實含攝文化」的兩種觀點，而特殊論則有「分配並列」與「階層滿足」之說。在目前的歷史與國關文獻當中，「分配並列」是一個具有優勢的方法論策略，此時特殊論者可以證明現實權力無法完整解釋國家行為，而必須加入文化義理的因素，但這並不能排除權力仍有產生作用。於是兩種理論的爭論變成了解釋程度大小的爭論，而非全有與全無的辯難。在不同理論均有其效力的情況之下，做相對解釋能力的判定自然會較為困難。

第四、在古代和當代的解釋之間，是否有其內在聯繫，還是有一鴻溝，也就是如何跨時？由於歷史就是過去的當下，而與現在一氣相承，因此武斷地分

割二者自不足取。然而，如果要使歷史的研究和討論對於現在產生意義，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歷史對當代產生作用的機制：是歷史教育、是菁英學習、是心理偏好、是文字的可近性、是文化的自在傳承，甚至是有意識的思想工程？在這一方面必須打開一個全新的領域，以及需要更多其他學科的投入。如果能夠有效地建立歷史與現代的聯繫，認知歷史發揮當下影響力的機制，則對於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理解，將會和今日中國的對外行為直接關聯起來。雖然我們認為中國的古今可比性較強，但是對於跨時機制的研究，以肯證歷史的當下意義，仍然是極端迫切的。

## 玖、結論

從歷史上來看，國關理論的發展是與現實密切互動的，此一現象在當今表現地極為明顯。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召喚著具有解釋力的國關理論，並重新點燃了學術界對權力轉移論的興趣，也催生出了一系列針對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戰略互動的理論文獻。從這些理論出發，未來美中關係的走向將受到許多變數的影響與制約。對於權力轉移理論來說，美中之間相對權力差距的縮減已是必然，未來雙方的互動繫於中國對現狀的國際秩序是否滿意。中國若對現狀不滿，決定要挑戰美國，權力轉移理論的預測極其悲觀，即使是核子武器的存在也未必能阻卻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換言之，一個強大而又對現狀不滿的中國會是對國際體系最大的挑戰。但若中國認定現狀能確保其崛起的持續，不挑戰美國的領導，美中關係便能趨於穩定，國際體系也就沒有爆發霸權戰爭的可能。以此觀之，確保中國對現狀的滿意是一個降低國際體系霸權戰爭的釜底抽薪之計。為和平計，權力轉移理論會據此提出美國必須要有效控制中國對美的威脅認知的政策建議。但這點就與拜登政府國安團隊成員Doshi的看法有了分歧。根據Doshi的觀點，中國對美國的威脅認知越低，越可能採取宰制整個東亞的大戰略。若要能阻止中國完全重塑區域秩序，美國就必須給予中國一定程度的壓力，無可避免地中國的威脅認知也會隨之升高。

要能對美中關係的未來發展做出判讀，一方面我們必須預判美國會在亞太採取何種大戰略，會對中國採取什麼策略，另一方面還必須對中國的對美策略

做出預測。根據MacDonald和Parents的理論，亞太同時存在著促進與阻礙美國採取戰略縮減的因素，前者指的是日本及澳洲這兩個相對可靠盟友的存在，後者則是指美國長期在該區域佔據的權力優勢地位會使其不願意將此位置拱手讓人，因而美國充其量只可能減少對亞太的安全承諾，而不可能選擇全面性的戰略撤守。由此觀之，美中之間的戰略較量極難避免。Goddard的理論則強調了若美國認為其所建構的以自由主義為依歸之國際秩序正在崩解中，且又認為中國在傷口上灑鹽，美國將義無反顧地遏制中國。但若中國能在對外關係的互動中訴諸美國認為能強化現有國際秩序的正當性原則，為美國雪中送炭，美國便可能竭誠歡迎中國的崛起。換言之，最終的結果還是取決於中國的政策選擇。Shifrinson認為，中國將根據其認知的美國戰略價值高低來決定對美的政策。若美國能在中國的崛起過程中協助其剷平可能面對的阻礙，中國便會採取合作性的對美政策。反之，中國將利用其遽增的實力對美國施以嚴重的打擊。

權力轉移理論或者是其他的新興理論之基礎都是抽象的理論邏輯或者是西方的經驗事例，它們固然凸顯了在分析支配性強權與挑戰者的戰略互動時關鍵的結構或者是雙邊因素，但我們在將這些理論框架套入美中關係的分析時還是需要格外小心，因為一些有時必須具體到個體層次的理念或者主觀性因素也可能在作用。以權力轉移理論關切的對現狀滿意程度為例，中國對於現狀是否滿足以及在未來這個評估是否可能出現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認同：它來自何方，它的過去與現在為何，未來又該往走向何處。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很可能就是解開中國認同之謎的一把重要鑰匙。

為了從歷史中尋找中國對外行動的模式，並探索文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從2015年以來，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便與臺灣大學高等研究院與臺大政治系合作，聯合舉辦了五次以探究「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開了在台灣國際關係與歷史研究交流互動的新局，突破了歷史人文與國關社科之間的學術畛域。在這一系列突破性的跨學科互動當中，首次會議的主題是「中國再起I：歷史與國關的對話」（2015），展開了第一次的跨時之旅，探討歷史中國的對外關係，焦點是在「中國獨特嗎？文化對現實主義的挑戰」。在隔年的第二次學術會議中，主題轉移到「中國再起II：跨時、跨域、互動的觀點」，引進了除了跨時、跨學科之外的第三個跨越維度

——跨越地理區域，而向更進一步的一般化推進。在2019年舉行的第三次會議當中，強調了中國與周邊的不對等權力關係（中國再起III：與鄰邊互動的歷史與現實）。接下來的第四次會議（2020）則探究了從大國到小國與從小國到大國的兩種視角（以古鑑今IV：大國逐霸，小國圖存），同時引入了不均衡的三角關係的分析模式，試圖瞭解逐霸與大小國互動之間的關係。最後在2021年的第五次會議（權力轉移的膠著V：歷史的視角）當中，更與當今的國際現況進行了細緻的配對，探討權力轉移下的大國關係、對小國的影響，以及從東亞歷史探討權力轉移下競爭性和平的可能，其中澶淵之盟（1005）後的遼宋百年和平是探究的主題。

在上述的努力當中，核心關懷是在中國再起之際，召喚歷史，探索前現代東亞國際關係；在歷史與國關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之間搭建橋樑，相互豐富發明；並以古為鑑，觀照當前，探索未來。研究焦點在於兩大國權力轉移間的國際關係；大國逐霸與小國圖存如何互動；與現實國力與文化理念所扮演的角色。整體研究的目的，是以歷史的厚度來深化對世局的體認。因此，歷史與國關的研究在台灣自始具有學術理論與現實政策的雙重高度意涵，並與權力轉移理論相匹配，以詮釋古今霸權競爭。

透過多年來歷史與國關的理論探討，以及針對美中爭霸的聚焦討論，我們發現歷史的視角，經由理論的詮釋，可以對當今權力轉移的國際關係場景提供有用的觀點，並與權力轉移理論進行對話。歷史與國關聚焦於普適論（跨時跨域）與特殊論（跨時限域）的爭辯，其論爭的主題集中於文化與義理因素相對於現實權力究竟具有多大的影響力。這裡展現出一般國際關係理論中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論辯的形式，但是更具有歷史的厚度。權力轉移理論是屬於現實主義的一支，專注於分析崛起強權與現狀霸權之間的互動，雖然多認為二者間衝突的機率很大，但也承認特殊狀況下和平相處的可能。然而，和平權力轉移的條件究係如何，是此理論典範的關注焦點之一。歷史與國關的學者在此正可透過歷史與權力轉移理論對話，用理念與偏向結構論的權力轉移文獻相互補充。由於此二者均以理解與詮釋中國崛起下的國際關係為其關注焦點，因此可以充分地對話互動，以截長補短。當然要做到這一步，還需要突破許多的挑戰與侷限。

當今美中逐霸日漸激烈，牽動整體世局發展，而台灣正身處兩強相爭風暴中心的時刻。我們期待以權力轉移理論來發展分析框架，又以歷史與國關來深化經驗內涵，一方面掌握跨越時空的科學原理，一方面探索細膩精緻的文化意念，使得我們對於攸關國家生存的重大國際關係議題，能夠發展出足夠的知識能力，在學術與實務上做出貢獻。

（收件：111年9月13日，接受：112年1月10日）

# Hegemony and Challenge: An Interpretation by IR Theories

*Yu-Shan Wu*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 Academia Sinica

*Ronan Tse-min Fu*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 Abstrac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re always closely connected to real worl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s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today's world.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PRC stimulates IR theories that can grasp and respond to the international reality. Among those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History and IR approach" are of the greatest explanatory potential.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core argument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then focuses on its two critical variables: power gap between the hegemon and the challenger, and level of satisfaction with status quo by the challenger. The discussion then extends to the conditions of war and challenges to the theory. Finally, we discuss a nasc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stems from and critically dialogues with the original theory. Here we lay out policy options by the hegemon and the challenger, and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ir combinations. We then shift to the History and IR approach,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external behaviors. We emphasize the need to tak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nalyzing the "resurgence of China." Then we offer a typology for the history and IR literature, based on

whether the work concerned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We focus on the major debate in the literature: “Does culture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China’s external behaviors?” The generalists argue that traditional IR theories can fully explain China without resorting to its unique culture, or that th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edifice that seemed to have strong impact on China’s behaviors were reflection of the underlying balance of power. The culturalists counter that ideas were indispensable to fully understand China, or that culture constitutes the higher echelon of China’s psychological hierarchy. We conclude that both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history and IR approach are indispensable for understanding hegemonic rivalry in today’s world.

**Keywords:** IR Theories, US-PRC Rivalry, Power Transition, History and IR, Hegemony and Challenge

## 參考文獻

- 吳玉山，2010，〈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389-415，臺北：五南。Wu, Yu-Shan. 2010. "Quanli zhuanyi lilun: beiju yuya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Tragedy Prediction?]. In Tzong-ho Bao, ed., "Guoji guanxi lilu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389-415. Taipei: Wunan.
- 吳玉山主編，2018，《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台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Wu, Yu-Shan, ed. 2018. *Zhongguo zaiqi: lishi yu guoguan de duihua*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Confucianism in East Asi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陳欣之，2018，〈現代國際關係理論是否能充分解釋中國的對外行爲〉，吳玉山主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23-48，台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Chen, Hsin-Chih. 2018. "Xiandai guoji guanxi lilun shifou neng chongfen jieshi zhongguo de duiwai xingwei" [Ca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Fully Explain China's External Behaviors?]. In Yu-Shan Wu, ed., "Zhongguo zaiqi: lishi yu guoguan de duihua"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3-48.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Confucianism in East Asi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陶晉生，2013，《宋遼金史論叢》，台北：聯經。Tao, Jing-shen. 2013. *Song liao jin shi luncong* [Essays on the Histories of Song, Liao and Jin]. Taipei: Linkingbooks.
- 萬曉，2020，〈大國崛起與絲路烽煙：從隋唐經營西域看權力轉移下崛起國對小國的政策〉，《政治科學論叢》，83：1-54。Wan, Xiao. 2020. "Daguo jueqi yu silu fengyan: cong sui-tang jingying xiyu kan quanli zhuanyi

- xia jueqiguo dui xiaoguo de zhengce” [The Rise of a Great Power and the Silk Road Wars: The Strategic Choice of a Rising China towards the Serindia City-States during the Turks vs. Sui-Tang Power Transition Period].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3: 1-54.
- 趙汀陽，2011，《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Zhao, Ting-yang. 2011. *Tianxia tixi: shijie zhidu zhexue daolun* [The Tianxia System (Sinocentrism):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system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趙汀陽，2015，〈以天下重新定義政治概念：問題、條件和方法〉，《世界經濟與政治》，6：4-22。Zhao, Ting-yang. 2015. “Yi tianxia chongxin dingyi zhengzhi gainian: wenti, tiaojian he fangfa” [Redefining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with Tianxia: Its Questions, Conditions and Methodology].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6: 4-22.
- 閻學通、張旗，2018，《道義現實主義與中國的崛起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Yan, Xue-Tong, Qi Zhang. 2018. *Daoyi xianshi zhuyi yu zhongguo de jueqi zhanlue* [Moral Realism and China's Strategy of Ris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 濱下武志，1999，《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Hamashita, Takashi. 1999. *Jindai Zhongguo de guoji qiji: chaogong maoyi tixi yu jindai Yazhou jingjiqian*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Modern China: The Tribute-Trade System and the Modern Asian Economic Circl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 蘇軍瑋，2018，〈中國邁向盛世過程中的衝突處理模式：以漢唐時期為例〉，吳玉山主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187-226，台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Su, Jung-Wei. 2018. “Zhongguo maixiang shengshi guochengzhong de chongtu chuli moshi: yi hantang shiqi weili” [China's Conflict Management Pattern: Example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n Yu-Shan Wu, ed., “Zhongguo zaiqi: lishi yu guoguan de duihua”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87-226.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Confucianism in East Asi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llison, Graham.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Allison, Graham. 2019. "Cou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 Rivalry Partner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ould-united-states-and-china-be-rivalry-partners-65661> (May 16, 2022).
- Anders, Therese, Christopher J Fariss, and Jonathan N Markowitz. 2020. "Bread Before Guns or Butter: Introducing Surplus Domestic Product (SDP)."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4 (2): 392-405.
- Arbetman, Marina, and Jacek Kugler. 1997. *Political Capacity and Economic Behavior*. Boulder: Routledge.
- Baldwin, David A., ed.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Direction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ang, Peter. 2010. "Commanding and Consuming the World: Empire, Tribute, and Trade in Roman and Chinese History." In *Rome and Chi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 edited by Walter Scheid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ley, Michael. 2011.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3): 41-78.
- Beckley, Michael. 2018. "The Power of Nations: Measuring What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 (2): 7-44.
-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16. *America Abroad: Why the Sole Superpower Should Not Pull Back from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llahan, William A. 2012. "Sino-Speak: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 (1): 33-55.

- Carr, Edward Hallett. 1940.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Carroll, Robert J., and Brenton Kenkel. 2019. "Prediction, Proxies, and Powe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3 (3): 577-593.
- Chai, Tommy Sheng Hao. 2020. "How China Attempts to Drive a Wedge in the U.S.-Australia Alli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4 (5): 511-531.
- Chan, Steve. 2004.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The Recognition of Revisionist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4 (2): 207-238.
- Chan, Steve. 2020. *Thucydides's Trap?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Logic of Inquiry,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han, Steve, Huiyun Feng, Kai He, and Weixing Hu. 2021. *Contesting Revision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 Steve, Weixing Hu, and Kai He. 2019. "Discerning States'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Orientations: Comparing China and the U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5 (2): 613-640.
- Childs, Steven J. 2011. "Security as Satisfaction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Ph.D., California: The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902758082. Political Science Database;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A&I. <https://www.proquest.com/dissertations-theses/security-as-satisfaction-conventional-arms/docview/902758082/se-2?accountid=13877>.
- Copeland, Dale C. 2000.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rawford, Timothy W. 2008.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41." *Security Studies*, 17 (1): 1-38.
- Crawford, Timothy W. 2021. *The Power to Divide: Wedge Strategies in Great*

- Power Compet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anilovic, Vesna, and Joe Clare. 2007. "Global Power Transitions and Regional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3 (3): 289-304.
- DiCicco, Jonathan M., and Jack S. Levy. 1999.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3 (6): 675-704.
- Doshi, Rush. 2021.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elstein, David M. 2017.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airbank, J. K., and S. Y. Teng. 1941.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2): 135-246.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ddard, Stacie E. 2018. *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reve, Andrew Q., and Jack S. Levy. 2018. "Power Transitions, Status Dissatisfaction, and Wa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Security Studies*, 27 (1): 148-178.
- Hebron, Lui, Patrick James, and Michael Rudy. 2007. "Testing Dynamic Theories of Conflict: Power Cycles, Power Transitions, Foreign Policy Crises and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3 (1): 1-29.
- Huang, Chiung-Chiu, and Chih-yu Shih. 2014. *Harmonious Intervention: China's 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 Rethinking Asi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rnham: Routledge.
- Kang, David C.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4): 57-85.
- Kang, David C. 2020. "International Order in Historical East Asia: Tribute and Hierarchy Beyond Sino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 *International*

- Organization*, 74 (1): 65-93.
- Kang, David C., and Xinru Ma. 2018. "Power Transitions: Thucydides Didn't Live in East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1 (1): 137-154.
- Kang, David C., Dat X. Nguyen, Ronan Tse-min Fu, and Meredith Shaw. 2019. "War, Rebellion, and Intervention under Hierarchy: Vietnam-China Relations, 1365 to 1841."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3 (4): 896-922.
- Kang, David C., Meredith Shaw, and Ronan Tse-min Fu. 2016. "Measuring War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1368-1841: Introducing Chinese and Korean Language Sour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0 (4): 766-777.
- Kim, Woosang. 1992.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 45 (1): 153-172.
- Kim, Woosang. 2002.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6 (5): 654-671.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llen Lane.
- Kissinger, Henry. 1995.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Kugler, Jacek, and Ronald L. Tammen. 2012. *The Performance of N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Group.
- Kugler, Tadeusz, and Siddharth Swaminathan. 2006. "The Politics of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8 (4): 581-596.
- Lee, James. 2019. "Did Thucydides Believe in Thucydides' Trap?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and Its Relevance to U.S.-China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1): 67-86.
- Lemke, Douglas. 2002.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mke, Douglas. 2003. "Investigating the Preventive Motive for Wa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9 (4): 273-292.
- Lemke, Douglas, and Jacek Kugler. 1996.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 Ledger*, edited by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3-33.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emke, Douglas, and William Reed. 1996. "Regime Types and Status Quo Evaluations: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2 (2): 143-164.
- Levy, Jack S. 1987.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40 (1): 82-107.
- Levy, Jack S. 2008.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ited by Robert S. Ross and Feng Zhu, 11-33.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m, Yves-Heng. 2015. "How (Dis)Satisfied Is China? A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 (92): 280-297.
- MacDonald, Paul K., and Joseph M. Parent. 2018.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chiavelli, Niccolò. 1981. *The Prince*. London: Penguin Books.
- Mearsheimer, John J. 2021. "The Inevitable Rival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100 (6): 48-58.
- Modelski, George. 1964. "Kautilya: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Ancient Hindu Worl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 (3): 549-560.
- Morgenthau, Hans J.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 Organski, A. F. K. 1958. *World Politics*. 1st ed. New York: Knopf.
- Organski, A. F. K.,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rganski, A.F.K. 1968.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Qin, Yaqing. 2018.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 Press.
- Rauch, Carsten. 2017. "Challenging the Power Consensus: GDP, CINC, 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Security Studies*, 26 (4): 642-664.
- Sample, Susan G. 2018. "Power, Wealth, and Satisfaction: When Do Power Transitions Lead to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2 (9): 1905-1931.
- Senese, Paul Domenic, and John A. Vasquez. 2008. *The Steps to War: An Empirical Stud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iffrinson, Joshua R. Itzkowitz. 2018. *Rising Titans, Falling Giants: How Great Powers Exploit Power Shif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obek, David, and Jeremy Wells. 2013. "Dangerous Liaisons: Dyadic Power Transitions and the Risk of Militarized Disputes and War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1): 69-92.
- Starrs, Sean. 2013. "American Economic Power Hasn't Declined—It Globalized! Summoning the Data and Taking Globalization Seriously<sup>1</sup>."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7 (4): 817-830.
- Tammen, Ronald L. 2008. "The Organski Legacy: A Fifty-Year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4 (4): 314-332.
- Tammen, Ronald L.,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and Allan C. Stam III.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 Tammen, Ronald L., and Jacek Kugler. 2006a.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1): 35-55.
- Tammen, Ronald L., and Jacek Kugler. 2006b.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 (1): 35-55.
- Tammen, Ronald L.,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2017. "Foundation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squez, John A. 1996. "When Are the Power Transitions Dangerous? An Appraisal and Reformulation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 *Parity and War*:

-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edited by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35-56.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Vasquez, John A. 2009. *The War Puzzle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squez, John A., and Marie T. Henehan. 2010. *Territory, War, and Peace*. New York: Routledge.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Book, Who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 Waltz, Kenneth N. 1981.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More May Be Better: Introduction." *The Adelphi Papers*, 21 (171): 1-1.
- Wang, Gungwu. 2004. "The Fourth Rise of China: Cultural Implication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 (2): 311-322.
- Wang, Yuan-kang. 2011.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ng, Yuan-kang. 2013. "Explaining the Tribute System: Power, Confucianism, and War in Medieval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3 (2): 207-232.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7.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rner, Suzanne, and Jacek Kugler. 1996. "Power Transitions and Military Buildups: Resol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ms Buildups and War." In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edited by Kugler Jacek and Lemke Douglas, 187-20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u, Yu-Shan. 2018. "The History-Informed IR Study on the Resurgence of China."

In *Decoding the Rise of China: Taiwa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edited by Tse-Kang Leng and Rumi Aoyama, 39-55.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